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light gray with a complex, abstract pattern. It features numerous thin, intersecting lines and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The pattern is more dense in the upper right and lower right corners, while the center is relatively clear, providing a space for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

编者董原

目 录

绪论	1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旧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	28
接管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29
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	33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39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教育体制	54
社会主义教育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62
教育领域的反右派斗争	62
教育革命的尝试	66
教育事业的调整	74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80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中的教育	87
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的发端和蔓延	87
所谓教育革命的实践	93
在教育战线上与“四人帮”的斗争	98
“文化大革命”给教育事业造成的破坏	107
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变和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112
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	113
教育战略地位的逐步确立	121
教育改革的兴起	123
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	131
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	139
教育的对外开放	141
新时期教育发展的状况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的产生	143

绪论

占全人类约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富于创造的智慧而闻名于世。五千年文明古国，早就用她创造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四大发明，造福全人类。她拥有的增产粮棉的精耕细作技术，预防治疗疾病的中医中药良方，色、香、味俱全的食品烹调，精美灵巧的丝绸服装，园林建筑、制茶、酿酒、陶瓷、雕塑等传统工艺，诗、书、礼、乐、歌舞、戏曲、绘画、书法等灿烂的文化，至今仍在国际上保持其特有的地位。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在于她一向重视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各种人才的教育事业。远在二千三百年前，《礼记·学记》（世界上最古老的教育理论著作之一）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等记载，这是对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很好的概括。

（一）

根据中国考古、历史、教育史学者专家的考证和研究，远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的夏朝时期，已有培育后代习文练武的学校；到公元前一千七百年的商朝，甲骨文单字已有 3500—5000 个，由学校教给学生。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由周朝初期的学在官府，到春秋的中后期，民间办理的私学开始兴起，儒家创始人孔子约在公元前五二一年前后，创办了尼山书院；战国后期的齐国的“稷下之学”，西汉于公元前一二四年开始办理太学，隋唐的国子学、天文、律算、医

学到宋、元、明、清的蒙馆、私塾、书院，逐步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学校教育体系，它造就了大批古代人才。

封建统治阶级把教育放在“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地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土地）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影响，教育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古代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培养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领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古代大教育家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就主张：庶（人口）、富（经济）、教（教育）和“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为立国之本。

从汉朝以后实行崇儒兴学起，古代学校采用的课程教材，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整理、编纂的夏、商、周三代文化典籍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又叫“五经”）和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课程，加上“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经过南宋理学大教育家朱熹注释），就成为古代学校比较流行的教材。这些教材，以传授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关系为主的伦理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孔子在《礼记·明堂论》中指出：“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者共之，皆可以明人伦也。”至于墨家、法家、道家等百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墨家），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后除去秦朝以法家学说为主外，一般都是儒家学说占着统治地位。

古代学校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大教育家，主张采用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

进、学思结合、言传身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比较符合教育规律的方法,但在封建社会思想禁锢的气氛中,尤其是到了后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多数学校都是采用死记硬背书本不让独立思考的注入式的方法。除暂短的秦朝禁止私学外,大多数朝代是实行官学(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学)与私学并举,国家考试选拔人才。

社会上倡导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二千二百多年前荀子(公元前二九八——前二三八年)提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他倡导将师和天、地、君、亲并列供奉在一起,成为千家万户顶礼膜拜的偶像,延续二千多年。

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学校教育和寺庙宗教活动分开,只有极少的少数民族,实行宗教与教育合一。学校摆脱宗教的控制和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学校的优良传统。

重男轻女,妇女长时期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唯独唐朝武则天女皇提倡男女皆可入学,有学问的女子也可以考状元,可惜这在封建时代仅是昙花一现。

学校的教学活动往往围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死读硬背书本为中心,脱离社会实际,脱离生产劳动,脱离人民,盛行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风。古代学校虽然也有天文、律算、医学等专科教育,但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受到科举制度的桎梏,专科教育不能发展,反而被排斥在官学之外。

总之,上述中国古代学校的特点中,既有可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这是造就中国古代文明、始终延绵不断,在世界上放出辉煌

光彩的一个原因；又有阻碍社会进步，使封建小农自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商品经济难于发展的消极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即明、清两朝，这种消极因素越来越为严重。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和科技文化水平停滞不前，以致落后世界二、三百年的重要原因。

（二）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使中国古老而保守的封建帝国，逐步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帝国主义伴随着对华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而进行文化侵略，它们在中国开办教堂、学校、医院、报刊杂志。一八七一年，美国教会首先在武昌办理文华学堂，接着，英、德、法、俄、日等国教会，都在中国办有大、中、小学校。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还得到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白银4.5亿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帝国主义就是利用从中国掠夺到的大量赔款（13亿两白银）的一小部分和教会的力量来办学校，以便培养其在华的代理人来“控制中国的发展”，即所谓“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军旗更为可靠”。但是，在教会学校里受教育的学生，在早期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爱国思想影响下，“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启发教育下，大多数人都走向反帝爱国的革命行列。

晚清末年，为了拯救清朝封建帝国而兴办学堂的洋务派，以张之洞（一八三七——一八九〇年）为代表。他在《勤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们主张“四书”“五经”等封建主义旧学为主体的“中学治身心”，用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来发展工业，增强对付外来侵略的国力，即所谓以“西学应世事”。在“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随着洋务运动官僚资本的发展，洋务派一八六二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接着在天津、上海、广州也开设了同文馆（即外国语学校）；一八六五年设立上海机器学堂；一八八〇年设立天津水师学堂（最早的海军学校），一八八五年设立天津武备学堂（最早的陆军学校）；一八九六年创办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

洋务运动中办的洋务教育历时三十多年，是以维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不可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多大的成效。帮助光绪皇帝进行“百日维新”运动的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与地主阶级的顽固派、洋务派有激烈论战。主要是在要不要变科举、废八股、提倡西学、办学堂的问题上展开的。他们认为兴办学堂、传授西方科学文化，是富民强国之本。康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进行讲学，他认为“蒙养之教，以德育为先”，从幼年起就要重视养成好的品行。梁于一八九七年任湖南时务学堂主讲，主张教育是培养有智、有权、有德、有才的“新民”。一八九八年在“百日维新”运动的影响下，设立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各省、州、县的书院、塾、馆，也纷纷改为大、中、小学堂，这是开中国现代学校之先河。但是，广大农村还是以蒙馆、私塾为主。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四年，开始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学成后逐年回国；学习科目主要是军政、船政、步操、制造，同时还派学生到英、德、法、日、俄各国去留学，辛亥革命前后留日学生上千人。在中国近代留学人员中，曾经出现了一批爱国的学者、专家，他们是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文化教育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与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的斗争。孙中山先生从中华民国成立起，就主张在全国普及教育，发展实业教育和科技教育，尤其重视师范教育。他认为“四万万人民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普及教育可以使国民有学问，“懂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可惜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北洋军阀统治到一九二七年。北洋军阀仍然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来开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现代学校主要学习德国、日本的教育模式；“五·四”运动以后，主要学习美国的办学模式，其中留学教育也以留美为主。一九一一年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建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二四年改为清华大学。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政府开始逐步统治大半个中国，实行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资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需要的“党化”教育，传播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但在开办各级各类学校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对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和培育人才，起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地区，曾经涌现出一批对于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教育家。其中以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陈鹤琴等人为代表。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年），中国近现代民

主革命家、教育家。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一月，就任孙中山为总统的南京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教育宗旨应采用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国民教育，美感教育（用美育代宗教），世界观教育即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教育。蔡于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用民主和科学精神来办大学，男女入学平等，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论，实行“兼容并包”；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一九二七年，蔡任最高教育行政和学术机关（仿效法国模式）大学院长，次年就提出教育宗旨应该是：“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养成劳动习惯”，即德、体、智、美、劳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后来，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三二年，他同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选为副主席，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年），中国人民教育家。陶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归国办教育，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育主任。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教育改革，他和蔡元培、晏阳初等人一起提倡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他从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受不到教育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要为普及乡村教育培养100万个教师，乡村教师必须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后来又加上健康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一九二七年春，他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一九三二

年秋创办山海工学团；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前后，他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一九三九年在重庆创办了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干部的育才学校；一九四六年初在重庆市创办革命的社会大学，在他的学生中有许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优秀人才。

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年），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是中国倡导职业教育的先驱，并于一九一七年建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翌年在上海创办职业学校，学文化和学职业结合，实行做学合一。黄主张建立一个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补习、再补习的职教体系，实施职教的目的“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能力之准备”；极力倡导“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陈鹤琴（一八九二——一九八二年），中国民主革命家、儿童教育家。陈从一九二三年在南京创办鼓楼幼稚园兼任园长，是中国兴办现代幼儿教育的先驱，家庭教育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教育的宗旨要使受教育者，从小开始养成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合作的态度、创造的能力和服务的精神。

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陈鹤琴等一批现代教育家，尽管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不占主导地位，本身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至今仍是中国教育思想中珍贵的遗产，应当吸收其中的精华，做为发展和改革社会主义人民教育事业的借鉴。

（三）

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性质的。在农村，封建的私塾占相当大的比重；在私立学校中，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占的比重也比较大。例如，一九四七年在 125 所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私立学校约占 44%，在私立学校中，受外国教会津贴的约占 34%。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大片领土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实施了奴化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又实施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在旧中国，教育不发达，文盲充斥，学校的分布很不平衡。中学大多数设在县城以上城镇，农村却很少。有的县无中学，有些区乡无小学。高等学校有 40% 设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 6 个城市，国立大学的 40%、私立大学的 46% 设在沿海地区。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很少。一九四六年，新疆只有 100 人的新疆学院和 8 所中学，宁夏只有 5 所中学，青海只有 4 所中学，西藏连一所中、小学也没有。

各级学校绝大多数的图书资料、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不能独立自主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私立和国立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往往是派到欧美去留学，回来才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尽管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学位授予法》和《硕士学位考试细则》，一九四〇年公布了《博士学位的考试细则》，但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只授过 200 多名硕士，一个博士学位也未能授予。

在旧中国的教育领域，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驱的领

导下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学习、研究和传播新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广泛探求革命真理，积极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九年，由北京大学首先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的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青年学生，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一九二六年，清华大学等校师生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同年十一月，清华大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成为领导清华大学地下革命活动的坚强堡垒。一九三五年在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围剿”的惨败。后来，中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广泛地开展革命斗争。例如，一九四五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掀起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著名的民主战士闻一多教授惨遭敌人暗杀。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被称为与解放战争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大多数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四）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

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自一九一七年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创办工人夜校和自修大学。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经历了二十二年。在这二十二年中，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进展，革命根据地数量不断增加，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也随着根据地面积不断的扩大而扩大，并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增添了新的篇章。在二十二年革命根据地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政策，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内容，包括了社会教育、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以干部教育为重点，都取得了当时条件下能取得的意义重大的成果。是中国教育史上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是开天辟地的创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对社会主义教育包括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成人识字扫盲教育、普通教育（幼儿教育 and 中小学教育）都十分重视，特别是把干部教育做为教育工作的重点，为人民解放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这些，都使革命根据地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据陕甘宁边区不完全统计，一九

四〇年的小学校数目和学生人数，分别比一九三七年增加了约3倍和7倍。一九四六年小学生数比一九四〇年又增加了约5.5倍。中等学校的学生人数一九四一年为一九三七年的51倍，一九四四年又比一九四一年增加51%。成人参加各种扫盲识字学习的人数，一九四一年比一九三七年增加3.8倍。其他解放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行了“干部教育第一”的原则。为此，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延安先后建立了17所干部学校。著名的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各根据地都开办了干部学校。在抗日战争中，仅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其10所分校，就培养了近20万军政干部。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习自由，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有计划地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扫除文盲，扫除一切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批判地吸收外国的和中国古代的文化，等等。一九四八年七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要求大规模地办抗日军政大学式的训练班，对于新解放区的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造。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

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为全国的解放做好干部准备；新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在校供职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在解放区按照上述方针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华北解放区先后召开了中等教育会议、小学教育会议，确定了中小学的教育方针，制定了实施办法，并推广到各解放区。东北地区解放较早，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东北解放区先后召开了4次教育工作会议。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的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总结了东北地区三年来的教育工作。据统计，一九四九年小学校数和学生数，比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分别增加了1.4倍和1.5倍，中等学校数目和学生人数，分别增加了0.4倍和3.9倍。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高等干部学校培养了37971名学生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城市职工有29.1%参加了各类学习组织。一九四八年冬，有120余万农民参加学习。取得上述成就，主要是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团结与培养知识分子的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初等教育和成人教育。

在解放战争期间，各解放区都举办了大量的各类干部学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著名的有东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中原大学等。此外，各解放区也设立了各种干部学校，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训练班、暑假学习团，招收了大量知识分子，为新解放区

输送了大批干部。

解放区的教育工作，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上述成就，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果，其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吴玉章等为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人民教育思想，产生和发展于根据地老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着重解决教育如何为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夺取政权以及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战略思想，使经济发展战略转移到依靠科教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协助毛泽东办理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年）。徐特立自本世纪初创办周南女校和湖南长沙师范以后，终身从事创建人民教育事业。他曾任中央苏区教育人民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主管教育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他主张办教育必须具有战略眼光，既为当前现实服务，又不可忽视历史，并顾及将来，力求使教育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实现“通”

与“专”的统一；做学问运用中、外、古、今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中国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在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青年学生和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著有《教育史 ABC》、《新教育大纲》及教育论文上百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论述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为统治阶级服务，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各种改良主义教育思潮，指出新教育要为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必要性。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年），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人民教育，曾任四川成都高师和重庆政法大学校长，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上万的优秀人才。他曾指出：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不仅要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而且要重视培养经济科学、经营管理人才。远在一九五四年，作为中国教育工会首任主席，他就明确提出：学校教师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要依靠教师办好学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教育方面的论述，其要点如下：

第一，明确教育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干部和人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